

- 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丛书 -

丛书主编：杨云彦

超低生育率与 未来生育政策导向

石智雷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丛书 -

丛书主编：杨云彦

超低生育率与 未来生育政策导向

石智雷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低生育率与未来生育政策导向/石智雷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1

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丛书/杨云彦主编

ISBN 978-7-307-18576-0

I. 超… II. 石… III. ①生育率—研究—中国 ②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中国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3372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字数:304千字 插页:1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8576-0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研究工作和出版得到以下课题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ZD038）子课题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关系研究”；

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二孩政策实施与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项目编号：2015188）；

宜昌市卫生计生委重点项目“生育政策调整与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总 序

35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在人口发展的历史上，却注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启动，其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强大的政策力量，干预大众生育行为，促进人口的转变。随着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出台，既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完成其历史性使命，又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35年的人口发展和政策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值得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的课题。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效值得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加快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带来诸多不利的社会后果和潜在风险，包括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受到减弱，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加重等。因此适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非常有必要。

中央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激发了学界和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政策“遇冷”，有观点认为基本符合预期，在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国的人口转变已经从外生主导型阶段进入到内生主导型阶段。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下，怎样看待当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行为的走向，怎样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成为新时期非常迫切的研究课题。

着力创新理论和分析框架，阐释人口转变从外生型到内生型的变化机制，对准确性当前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判定低生育水平地区是否面临低生育水平陷阱的风险，避免人云亦云、就事论事，是非常有必要的。关于人口红利的系统、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人口、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丰富宏观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包括当下广泛见诸新媒体的有关二孩生育“生不起”的说法，是简单的抚养成本问题，还是深层的社会行为变化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有利益导向机制

上的新应对，这既是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理论问题，它为我们超越传统的生育理论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我们需要对既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科学评估，既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又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是新形势下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政策措施。早在1980年《公开信》中就指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明确了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帮扶政策。在新形势下，这一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在我们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期间，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重大政策调整，为我们研究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公共政策响应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从利益导向政策的评价、人口转变和生育行为变化、家庭发展能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三维人口红利等专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政策成果，结集出版的六部专著，正是这些成果的展现。希望这些成果的出版，能为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人口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积累。

杨云彦

2016年5月12日

题 记

自从点点在两岁多那年发明出“为什么”这个词语之后
我已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运用这个词语来发布一些新的疑问了
但我记得她在上幼儿园的第一个学期，一次次在深夜哭醒
并向我们发出质问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我真的不想上幼儿园
记忆中这些艰难而心烦意乱的时辰
我们夹杂着爱抚与呵斥的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
一次次凸显着生命深处那共同的沮丧
我又能从这密密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
一个在深夜依然亮着灯光的窗台之上
发明出怎样的答案
是一次尘世欢娱的残余
是将从远古迢递而来的，此刻在我们身体中流淌的血液
引向时间另一侧的至深处的隐秘的欲望吗
还是仅仅是爱，那完全的爱
但并非全部的
并附赠这尘世如此坚固的虚无

前言：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及其解释

人们为什么要生孩子？

作为一项人类最基本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行为，或许只有小孩和哲学家才会提及此问题。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来临，人类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该问题直白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在死亡对生命体的普遍胁迫下，生育繁衍是物种存在的基本条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使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生育也是抗拒死亡、繁衍家族的基本力量，并且发展成不同文化风格的生殖崇拜。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影响人们生育的原因相对复杂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复杂因素作用下人们生育行为的群体性结果与历史上任何阶段都完全不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本书关注的主题——现代社会的超低生育率。

尽管人类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借用阶段论的方法仍然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结合社会的变迁，人类的生育转变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生存推动生育阶段，时间上处于工业革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处于生存推动生育阶段：只要有粮食剩余，人们就会尽量多地生育子女，直到不具备下一个子女生存的条件，生育才会停止。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讲，这种特质是进化中的优势。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剩余总是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社会发展处于低水平均衡，也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这时，作为个体没有谁会考虑人类种族的繁衍，也很少会想到自己对于后代基因传递的责任。但是在这一时期，种族繁衍通过影响国家军事力量 and 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并以家族和传统观念的方式约束着家庭的婚育决策，最后达成人口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均衡。在物种匮乏、战争频繁的年代，毕竟只有更努力地繁衍后代，才能够保证种族能够优胜，保持国家或群体的竞争力。可见，个体不理性导致了群体理

^① 在不同国家或者文化中，这两个阶段有不同的时间长度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性结果。

第二阶段是成本—收益推动生育阶段，也可以称为理性生育期。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物质性消费已经不是人类和个体发展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现代化和市场化也冲击了家族影响和传统观念，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结婚和生育不再是人们生命历程的必然和固定选择。人们在充分考虑生育孩子的收益和成本之后，再做出决定是否、何时以及生育几个孩子。

第二阶段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第一次人口转变期和第二次人口转变期。第一次人口转变期，人们考虑的重心在于家庭和孩子，父母的主要时间、经历和物质集中投资于孩子。在理性决策下，生育子女存在数量—质量替代规律，人们为了提高子女的素质而选择少生孩子。第二次人口转变期，人们考虑的重心从家庭和孩子转移到个人发展。人们的行为选择更加体现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生育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人们为了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实现个人发展而选择少生孩子，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 1.0 左右。生育水平的持续降低，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供给不足等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背离，个体理性导致了群体不理性的结果。

人口转变不是某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所特有的规律，而是全世界性的人口生育革命。在快速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约而同地快速下降。比如二战后的发达国家，从 1960 年到 1980 年，英国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从 2.72 个下降到 1.90 个；德国从 2.73 个下降到 1.56 个；法国从 2.74 个下降到 1.95 个；荷兰从 3.12 个下降到 1.60 个；美国从 3.65 个下降到 1.84 个。后起的亚洲发达国家，日本从 2.0 个下降到 1.75 个；韩国从 6.0 个下降到 2.82 个，之后一直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近些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育率也在降低。从 1980 年到 2014 年，印度妇女人均生育子女数从 4.68 个下降到 2.48 个；南非从 4.79 个下降到 2.23 个；巴西从 4.07 个下降到 1.74 个。绝大多数已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包括中国）并没有达成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均衡，而是越过了更替水平均衡点，走向更低的水平，很多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从 1990 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 1.5 以下；西班牙、波兰、希腊、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 2014 年已经低于 1.3^①。

目前来看，越是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越低。同样在一个国家内，农村地区生育

^① Economic O.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J]. France: OECD Publication Service, 2015.

率高于城市地区；越是富裕的家庭，一般孩子数量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生物学原理，随着一个物种生存环境的改善，该物种的生育率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站在物种金字塔顶端的人类，拥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社会属性。现代性是对人类社会属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都会面临生育率过低的困境。但是现代化带来的人们对生育决策的选择性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发展。从传统到现代，从欠发展到发展，对于个体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之前的行为都是被动的、无可选择的，而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自由，生命历程从单向度变成多维度。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就处于一种欠发展的状态，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仅仅是延续一种设定好的模式在行进。到了生命的一定时期需要根据父母的安排结婚，甚至都不可以选择自己钟情的对象，之后开始生育孩子，赡养父母。而现在，无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婚姻和生育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方式，他们可以在适宜生育的年龄，选择去读书接受教育，也可以选择去工作，发展个人事业。

生育率的持续降低，这是大势所趋，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逐渐进入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中国在短短30年内就完成了欧洲国家超过100年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在197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5.51，到2000年就下降到1.74。改革开放从两个维度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一是对外开放，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二是对内改革，通过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进行全方面的改革，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最为重要的是自由流动空间的开放，让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另外，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速了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生育推行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但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全社会的宣传引导，少生孩子更是深入人心，使得独生子女成为今天人口的主要成分，并且目前育龄人口主力已经是独生子女。

中国地域辽阔，婚姻和生育文化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不可能是全国普遍性、统一推进的，它会在大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先发生，然后逐步蔓延到其他区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显现更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目前在中国并没有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实证性的研究。本书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刻画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的超低生育水平特征，并以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

实验，描述政策调整过程中人们的生育行为变动特征及未来走势，进一步从成本—收益失衡的视角解释在持续低生育水平下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自我强化机制。

本书研究发现，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核心特征，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超低生育率水平，不仅仅在现代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城市地区表现明显，在宜昌市农村地区也已显现。进入 21 世纪，宜昌市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 1.0 以下的水平，并表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其中，初婚和初育时间推迟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以往研究都认为农村地区生育率普遍高于城市地区，但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计算总和生育率皆显示，2014 年宜昌市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城市地区。

如果将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作为一项政策限制下人们生育行为的自然实验，那么实验结果显示，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政策限制水平，二孩政策实施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生育反弹。也就是说，低生育率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限制的结果。二孩生育政策逐步实施形成了释放效应、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三种政策响应效应叠加在一起，但对总和生育率回升影响并不大。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符合政策人群形成了释放效应。2003 年“双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在 2004 年宜昌市二孩孩次生育率有所上升；2014 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符合政策人群二孩生育数量有所增加。二孩政策的实施由于宣传力度和社会影响大，对原有符合政策人群产生了示范效应。另外，政策外人群“超生”的比重也有小幅上升，尤其表现在 29~40 岁之间的育龄妇女群体。

生育子女的成本—收益失衡是导致我国低生育率地区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因素，该因素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具有较大的自我强化机制，在宜昌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从成本角度来考虑，生育孩子的成本很高，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还在快速上升。哺乳动物一生下来，大部分都很快就有行为能力了（除了像大熊猫这种快要灭绝的物种）。而人类刚出生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要等到 1 岁才会走路，5 岁以前没有任何自我生存能力。到了现代社会，孩子要接受基本的教育，有条件的家庭还会将孩子送往大学，然后才会参加工作，在此之前 20 多年时间里都需要父母来照顾和供养。在中国，到这时父母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还需要继续挣钱帮助儿子买房或建房，准备婚嫁彩礼，甚至是继续照顾子女子女。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家庭呈现核心化趋势，养老变得社会化，人们更为注重当下和个人发展，生育孩子的诸多效用都在弱化。生育成本—收益的失衡使得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是自愿放弃生育孩子。另外在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几乎同时发生，影响生育行为的作用机制叠加在了一起，由此导

致生育子女的成本—收益失衡进一步恶化。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是首先面对第一次人口转变，接着面对第二次人口转变。

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严格执行的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首先，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几乎同时发生，家庭重心下移和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家庭重心从大家庭转移到核心家庭，进一步下移到子女身上，而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意识和自我的发展。其次，中国的人口转变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国城市居民的生育模式越来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生育模式，而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其生育观念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生育模式。中国的人口转变在城市和农村并不同步，城市和部分超低生育率地区已经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而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阶段，甚至是处于人口转变早期阶段。来自宜昌农村地区的研究显示农村生育观正在逐渐被城市生育文化渗透和改变。

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影响在持续发生作用。生育率的降低和独子化，改变了孩子自身的概念和意义。孩子数量的减少，让父母对孩子重视度更高。父母寄予孩子更多的期望，他们的主要时间、经历等都用于培育子女，“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他们用家庭支付能力的上限来养育第一个孩子，或者说这唯一的孩子。中国仓促地进入“孩子王时代”。独生子女群体加速了中国个人主义观念的发展。独生子女一代成长为父母，对于生育率的降低很关键。他们一直是家庭的核心，自我意识强，更为注重自我的发展和成长。独生子女的增加还导致两性之间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家庭分工中，也体现在职场上。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影响效应已经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程度和形式都不会类同于欧洲。首先是城市地区。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表现出较强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其一是超低的生育率；其二是生育推迟，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其三是快速上升的离婚率，单亲家庭数量上升；其四是婚姻家庭的多样性，同居增加，非婚生育数量也在增加。推动中国城市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核心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家庭中心走向个人中心，尤其是女性个人意识和女权意识的上升。城市女性希望摆脱对家庭，尤其是对丈夫的依附关系，强调男女关系平等，和男性一样去追求个人独立的生命历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女性会选择推迟进入婚姻时间，以延长个人知识积累和能力增长的时间。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提高对生育水平产生双重效应：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收入效应提升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但是子女养育成本也会随之升高，不能

显著提高人们的多孩生育意愿。挤出效应是指女性的职业发展会提升其社会地位，同时减少她们在家庭劳务分工中的分配时间，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另外，家庭地位较高的女性，议价能力更强，减少了非意愿生育的可能。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思潮对中国农村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远没到欧洲国家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时的发展水平。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多取决于自身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的努力。他们没有必要等到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才能结婚，传统大家庭对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重心从原来的“父母取向”转向“子女取向”。在这种模式下，父母依然全力养育子女，有能力的父母还要为他们建房或者购置房屋，筹备婚礼。但是等子女成家立业，独立门户，他们依然是“子女取向”。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反哺更是被空间距离割裂。资源都往下一代转移，养育子女的收益在快速下降。

另外，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在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外流等因素的推动下，过去以儿子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模式正在转变为儿女共同养老的新模式；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发挥着重要的养老功能，甚至比儿子养老效用更大，并且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在将来是一种趋势。女儿赡养的出现或者说养老功能的提升，一方面是在家庭养老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家庭进行适应性调整、开发新资源的一种家庭策略；同时也说明了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折射出当代中国性别趋于平等的社会进步性。但是低生育水平下又将产生新的独生子女家庭，儿女共同养老模式会显著弱化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减少人们对生育子女数量的需求，由此降低人们的多孩生育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低生育水平的自我强化过程。

目前，像宜昌市这样的低生育率水平在全国尽管不多见，但如果未来这种现象蔓延到其他城市甚至全国，会给社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最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力自愿的短缺，进而影响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国家竞争力。针对目前部分地区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长期的累积效应必将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中国人口及其生育命题迫切需要从全局和长期视角下进行深刻剖析，严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呼唤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以指导大众的生育观念和政府的政策实践，此为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初衷。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调整	4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生育政策调整	4
一、计划生育思想形成与生育政策反复时期	5
二、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与完善时期	7
三、计划生育政策成熟期：从控制生育走向综合治理	9
四、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时期：逐步放松	11
第二节 中国的低生育率：争议与共识	14
第三节 长期低生育率的警示和危害	15
第二章 低生育率及其理论解释	19
第一节 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	19
一、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口思想	19
二、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20
三、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23
四、邦戈茨低生育率理论	23
五、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24
第二节 低生育率理论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26
第三节 “低生育陷阱”：两种不同的声音	30
一、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支持	30
二、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质疑	31
第四节 超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率回升	32
一、进度效应减弱的影响	33
二、有效生育政策的影响	34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样本特征	37
第一节 研究设计	37
第二节 第一层次抽样：湖北省调查	39
一、大样本数据	39
二、访谈抽样	41
第三节 第二层次抽样：宜昌市调查	43
一、大数据样本	44
二、深度访谈数据	44
第四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不同区域生育格局变动	47
第一节 符合二孩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	47
一、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明显低于预期	47
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时间安排没有城市家庭迫切	48
三、二孩政策进一步强化区域差异化生育格局	49
四、就业迁移降低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	50
五、不同代际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明显	51
六、文化程度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52
七、一孩性别影响二孩生育选择	53
八、经济压力大导致人们放弃生育二孩	53
九、男孩偏好在弱化	54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与区域生育格局的变动	55
一、生育政策与区域生育格局的关系	55
二、区域划分与研究方法	57
三、单独二孩政策对区域生育格局的影响效应	58
四、区域生育格局的变动	60
第三节 “单独二孩”政策有助于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吗?	61
一、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争论	61
二、“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作用机制	63
三、“单独二孩”政策性别比降低效应的描述性证据	66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效应	68

第五章 超低生育率地区的生育模式	72
第一节 生育行为和生育模式的区域差异	72
第二节 婚育模式	73
一、超低生育率地区婚育模式的总体情况	73
二、初婚、初育年龄及其婚育间隔变化	75
第三节 生育行为	77
一、不同年代的生育行为	77
二、分受教育程度的生育行为	79
三、分职业的生育行为	80
第四节 生育水平	82
一、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	82
二、育龄妇女生育水平	83
第五节 超低生育地区的婚育行为特征	86
第六章 超低生育率地区生育政策响应	88
第一节 宜昌市人口转变过程	88
第二节 孩次递进总和生育率的基本思想及计算方法	89
一、以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	91
二、孩次递进生育率与孩次递进比	91
第三节 超低生育地区总和生育率	92
一、宜昌市 2000—2014 年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92
二、总和生育率的城乡差异	95
第四节 二孩放开后低生育地区的政策响应	96
一、二孩政策带来生育反弹了吗	96
二、政策响应的示范效应	97
三、政策响应的释放效应	99
四、政策响应的扩散效应	100
第七章 鼓励性生育政策实验：投资二孩？	102
第一节 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原因分析	102
一、是否打算生育二孩	102
二、已有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	105

三、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原因·····	108
第二节 从生育限制到生育激励：韩国经验借鉴·····	112
一、放任生育阶段：建国初期·····	112
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阶段：严格限制人口数量·····	112
三、生育政策转变时期：1996—2004 年的新人口政策阶段·····	114
四、鼓励生育政策阶段：2004 年至今·····	115
第三节 生育补贴下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模拟实验·····	118
一、响应政策选择再生育的总比重低于 50%·····	118
二、激励政策组合越丰富越容易获得响应·····	119
三、早期教育补贴的政策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119
四、受教育程度高的育龄妇女更易响应激励·····	120
五、有务工经历的育龄妇女更易响应激励·····	120
第四节 低生育率陷阱与持续低生育率的危害·····	121
一、宜昌市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121
二、持续低生育率的危害·····	122
第八章 城乡生育率的反转：偶然还是必然？·····	126
第一节 差异化生育政策与城乡生育率变动趋势·····	128
一、城乡差异化生育政策·····	128
二、中国城乡生育率变动趋势·····	129
第二节 超低生育水平地区的城乡生育率及其变动·····	131
一、超低生育水平地区城乡生育状况·····	131
二、城乡总和生育率的反转·····	131
第三节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城乡生育率的反转·····	133
一、城乡生育推迟·····	134
二、人口流动、职业发展与婚姻推迟·····	141
三、二孩生育政策影响效应的城乡差异·····	144
第九章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生育的成本—收益失衡·····	150
第一节 成本收益失衡、学习演化与生育选择·····	150
一、低生育水平的自我强化：综述性回顾·····	151
二、养老模式变迁、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成本收益的失衡·····	153